

暨南国学丛书

陈维崧年谱

C H E N W E I S O N G N I A N P U

陆勇强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陈维崧年谱

C H E N W E I S O N G N I A N P U

陆勇强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陈维崧年谱/陆勇强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9

(暨南国学丛书)

ISBN 7-5004-5697-2

I. 陈… II. 陆… III. 陈维崧 (1625 ~ 1682) — 年谱 IV. 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68727 号

责任编辑 曲弘梅
责任校对 韩天炜
封面设计 弓禾碧工作室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鑫鑫装订厂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6.75 插 页 2

字 数 448 千字

定 价 3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责任编辑：曲弘梅

封面设计： 弓禾碧工作室
GONGHEBIGONGZUOSHI

暨南国学丛书序

暨南大学的前身是1907年初在南京创办的暨南学堂。其诞生是出于华侨教育的迫切需要。

我国古代不乏在文化和经贸上的对外交流，汉、唐、宋三朝尤甚。相比之下，明代虽有郑和下西洋，清康熙帝也对外来文化怀有很大的兴趣，但总的来说，这两朝多处于海禁时期。直到鸦片战争，西方的坚船利炮打破了大清朝封闭的国门，自此，海禁大开。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在东南亚和美洲的开拓，我国东南沿海的穷苦人民也因迫于生计而出国谋生，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不少政治流亡者流落到了东南亚，使得南洋群岛的华人大增。在世界风潮和国内维新运动的影响下，海外侨胞的近代教育也为之兴起。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改变了过去私塾义学的办学模式，相继办起了一批新式学堂。但由于地处南洋的此类学堂多缺乏师资和教材，教学质量得不到保证，因此，在华侨中普遍出现了回国升学的愿望。

1905年，两广总督岑春煊派员前往爪哇和新加坡等地视察华侨教育，1906年，清政府学部再度派人到南洋调查学务，年底，电咨两江总督端方关于在南京办理爪哇侨生归国读书事，得到了端方的肯定。端方向朝廷上奏折，提出了南洋各岛和檀香山、旧金山等地侨民如有愿送子弟来宁就学，“并当一律收取，以宏教泽而系侨情”。清政府批准了这一奏折，招收侨生的暨南学堂遂于南京开始筹办。1907年3月，国内第一所华侨学校在南京鼓楼薛家巷诞生，因学生多来自南洋，故取《尚书·禹贡》中语：“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名之为“暨南学堂”。

暨南学堂在辛亥革命中停办，1918年又在南京薛家巷复校，分设师范、商业、补习诸科和小学。因侨校所负“声教南暨”的使命，遂据孔子所说的“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立下了“忠信笃敬”的校训。在经过了商科迁沪及与东南大学合设上海商科大学之后，暨南迁校至上海近郊的真如，使得在此地的1923年到1937年，成为了暨南校史上的辉煌时期。1927年郑洪年被任命为校长，提出了三部六院的华侨最高学府发展目标，暨南学校得以升格为国立暨南大学。

暨南大学经历过南京创建、真如发展、迁址孤岛和福建建阳以及战后回沪等时期，在新中国建国后，由于在校侨生甚少，加以物质条件十分困难，遂于1949年9月合并入交通大学和复旦大学等校。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回国求学的华侨学生逐年增多，经国务院批准，暨南大学于1958年在广州重建，陶铸同志兼任校长。经近10年的努力，暨大已发展成一所粗具规模的文理科综合性大学，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却成了重灾区，被迫于1970年撤销，校址被占，各系科分别并入其他各校。1978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恢复暨南大学，并进行重点扶植，自此，暨大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20多年来，学校的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教学和科研水平不断提高，重新恢复了华侨最高学府的地位。

在暨南大学迄今98年的历史中，虽经历了三落三起的曲折，也因战争和政治的诸多原因，使“系侨情”的宗旨受到了干扰，但就总体而言，始终是本着“宏教泽”的目的而不忘“声教南暨”的。从办学之始，就是为了适应华侨眷恋乡土、挚爱祖国文化之需，而将为华侨子弟开设祖国语言、文化等课程置于首位。在1927年郑洪年校长制定的《国立暨南大学计划大纲》中，明确提出了办学目的、方针是将暨南学校“扩充为一完善之大学”，“以期从质量上完成华侨之最高学府。使华侨子弟得享受世界高深的知识，与祖国优美的文化，以为他日参加祖国一切运动，及提高华侨地位之准备”。上海“一·二八”事变后，曾短暂代理校长的沈鹏

飞也认为“文学院文史课程，为发扬我国故有文化之主要学问”。因此，对暨南大学这一侨校而言，传统的“国学”具有了本土之学与“声教”“南暨”的特殊的、双重的意义。而在暨南大学的历史上，国学也确实曾有过很高的地位和较长时期的辉煌。

1927年秋，暨南大学的中国语文学系成立，开始招收新生，两年以后，文学院成立，下设中国语文学、外国语文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社会学四系。文学院院长为著名学者陈钟凡，中国语文学系主任为夏丐尊，后由陈钟凡兼任，此后又由陈柱尊继任中文系主任。外国语文学系主任为叶公超，继任主任梁实秋，历史社会学系主任黄凌霜，继任主任许德珩。在文学院任教的著名学者有李达、邓初民、钱亦石、杨公达、洪深、夏衍、张君勱、张世禄、沈从文、徐中舒、陆侃如、冯沅君等。即使是中学部，也有任国文教师的曹聚仁、汪静之，任英文教师的周谷城、顾仲彝、许国璋等著名学者。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曾先后担任暨大文学院院长的有陈钟凡、郑振铎、许杰、刘大杰、吴文祺等著名教授，担任中文系主任的有夏丐尊、陈钟凡、陈柱尊、龙沐勋、张世禄、郑振铎、许杰、刘大杰、郝昺衡等，担任历史学系（或历史社会学系、历史地理学系）主任的有黄凌霜、许德珩、张凤、周谷城、周予同、丁山等知名学者。1928年陈钟凡任中文系主任时，除自任散文、文学史教学外，还有教授陈柱教诗、古方言、专家文，刘觐教诗、《说文》、音韵，张凤教古文字学，兼任讲师陆侃如教诗史、诗论，郑振铎教小说，饶孟侃教文学概论、文法，讲师冯淑兰教词和词史，张世禄教语音学，龙沐勋、王家吉、马承钧教各体文，徐中舒教各体文和古文字学。仅此已可知当时暨大中文系教师阵容之盛。

在郑振铎任文学院院长时，第一年度（1935—1936）全力整理课程，然后努力充实中文、外文、史地诸系的图书资料，加强教学研究，提高教学质量。当时文学院还创办了三种学术刊物：《文史季刊》、《地理资料》和《中国戏剧》。校长何炳松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著有《通史新义》、《历史教学法》和《近世欧洲史》等，

他亲自组织编纂《中国通史》教材，自任委员，另有郑振铎、周予同、陈高慵、周谷城等为委员，由周谷城教授编著成书，问世后，深得好评，被很多大学用作教材，一再翻印，后来还在港澳、台湾和国外流行。暨大很重视在学生中开展学术活动，其中不少都属于国学范畴，如鲁迅在1927年和1929年曾三次被邀到暨大演讲，其中第三次所讲的是《离骚与反离骚》。中文系在1935年10月到11月间，曾先后举行两次讨论会，第一次讨论“文学之遗产”，第二次讨论“文学之趋势”。20世纪30年代，龙沐勋在暨南大学创立读书会，每天早上领着三四十个男女学生朗诵诗词，领会声情，使学生的诗词创作一时甚盛。龙沐勋又在叶恭绰等人的赞助下，创办《词学季刊》，在1933—1936年，前后出版11期，对词学研究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当时的暨南园不仅学会和刊物众多，而且很重视对文艺遗产的学习、继承，如文学学院院长陈钟凡为能使学生了解古音韵的奥秘，在1933年请昆曲名家俞振飞到校讲学，使得昆曲也在校园中流传开来。即使暨大经历了1932年“一·二八”事变的战火，学校遭受到不小损失，一度人员分散各地，但1936年《东方杂志》1月号刊载的黎照寰《青年努力新趋势》一文，仍将暨大与其他著名高校并提，在论述了全国教育界的形势后说：“广州的中山大学，上海的暨南大学，武昌的武汉大学，北平的清华大学，都像春花怒放，成绩斐然。”

1937年“七七”事变后，同年的8月13日，日军大举进犯上海，暨南大学地处战区，被夷为瓦砾场。在迁址租界后，“孤岛”时期的暨大，学术活动仍在进行。《暨大丛刊》持续编纂，十巨册的《中国历代天灾人祸年表》参考了一百多种图书资料，经四年编纂，于1940年出版，成为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重要参考书。继《中国通史》出版后，周谷城又在1939年出版了《中国政治史》，郑振铎出版了《中国版画史》。1940年，暨大创办《学林》月刊，所发的如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的新史学》、吴文祺的《近百年来中国文艺思潮》，都是带总结性的重要论文。即

使在南迁福建建阳的数年中，在极其简陋艰苦的条件下，也未中断学术研究。抗战胜利后，复员上海，文学院的著名教授及所讲授的课程就有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史、小说戏剧选，吴文祺的文字学、音韵学和修辞学，许杰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李笠、丁山的文字学，钱钟书的欧美名著选和文学批评，谭其骧的历史地理等。

在暨南大学复校广州后，文史两系分别由文艺理论家萧殷和中外关系史家朱杰勤任系主任。即使来自“左”的思潮干扰不断，学术研究也没有停止，如中文系在民间文学和语言学的研究上就很有成绩，历史系则完成了《番禺史志》的修改定稿。黄铁球教授曾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越南汉诗的卓越成就》的重要论文，张天翼、陈残云、秦牧等著名作家都曾到暨大作报告或讲课。但由于大环境的关系，“厚今薄古”、“古为今用”原则的确立，再加以暨大作为侨校已变更了早先的办学宗旨，传统意义的“国学”研究，在暨大1958—1966年的八年历史中，是难以讳言的中衰时期。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劫难后，暨南大学在1978年复办并招生，著名作家秦牧和文艺学家饶芃子教授先后任中文系主任，方言学家詹伯慧教授在80年代曾任文学院院长。新时期以来，暨大的古代文学学科虽无在上海真如时期那样的诸多大家，但也出现了一批名师和高质量的科研成果：老一辈学者汤肇民教授的唐宋文学研究，老诗人陈芦荻的刘禹锡研究，艾治平教授和郑孟彤教授的唐宋文学研究，李文初教授的汉魏六朝文学及陶渊明研究，洪柏昭教授的元曲和唐宋文学研究，王景霓教授的杜牧研究，都有较大影响，其中艾治平教授的《古典诗词艺术探幽》，郑孟彤教授的《唐宋诗词赏析》都在20年前获得了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至今，八十高龄的艾治平教授仍著书不辍，其中涉及古代诗词的著作就有10种之多，堪称成果累累，其他的老师也多是退而不休，仍在持续着自己的学术研究。

近十多年来，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下，暨南大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学校坚持“面向海外，面向港澳”的办学方向，承担起培

养海外高层人才的特殊任务，并成为了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大学。在办学水平全面提高，科研能力节节上升的同时，古代文学学科也不例外，学科成员不仅顺利完成了新老交替，而且建立起了较为合理的学术梯队。现在暨大从事古代文学和文献教学与科研的十多名主要成员中，只有两人是硕士，其余都是文学博士或从事过博士后研究，近90%的成员年龄在50岁以下，充满了朝气和锐气。暨南大学古代文学学科自1983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以来，经两代人的努力，20年后终于有所突破，在去年获得批准，具有了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建起古代文学博士点和古代文献硕士点，并在今年招收了第一届博士生，标志着学校的古代文学教学和研究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现在的暨大中国古代文学与文献学科，主要有四个研究方向：中国古代韵文学，儒释道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不仅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研究队伍，也出现了一批较有质量和影响的成果。其中韵文学方向以词学研究为主，艾治平教授的《婉约词派的流变》、《清词论说》、《花间词艺术》，魏中林的《词综注》，赵维江的《金元词论稿》和我本人的《唐宋词美学》、《中国词学批评史》（合著）等，多具有原创性。诗学研究有李文初教授等人合著的《中国山水诗史》和《中国山水文化》，李文初以诗歌为主的《汉魏六朝文学研究》和魏中林的《清代诗学与中国文化》，徐国荣的《中古感伤文学原论》，也是颇具首创性的著作。在儒释道与中国古代文学方向上，蒋述卓从事研究较早，其完成于80年代的博士论文《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被收入季羨林先生主编的《东方文化》丛书出版，还有《佛教与中国文艺美学》、《在文化的关照下》、《宗教艺术论》等著作，此外，刘绍瑾的《庄子与中国美学》、《复古与复元古》，张海沙的《初盛唐佛教禅学与诗歌研究》，分别论述了庄学、儒学与禅宗对古代美学和文学的影响，史小军的《复古与新变——明代文人心态史》，苏桂宁的《宗法伦理精神与中国诗学》，也属于该方向的著作。古

代叙事文学有程国赋的《唐代小说嬗变研究》、《唐代小说与中古文化》和《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张世君的《红楼梦的空间叙事》等。古代文学史料学有张玉春的《史记版本研究》等，以及集体编著的《宋代文学理论集成》、《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中国古代军事散文精选》、《中国历代小品选》、《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等。在以上四个方向以外，我本人又有交叉性、边缘性、跨学科的研究成果，如专著《有声画与无声诗》、《中国绘画思想史》、《古代文艺的文化观照》和《学者闻一多》（合著）等。

由于近年来对科研的提倡和重视，在高校“211工程”建设中，从教育部、广东省，直到学校，都对学科建设、发展给予了较大的投入、支持，更促使我们不得不努力，新的研究成果也随之产生。为此，我们据本学科点成员近年已经完成或即将完成的研究课题，编辑了这套丛书，共计11种，名之为《暨南国学丛书》，计有：徐国荣的《玄学和诗学》，张海沙的《曹溪一滴水——岭南禅学与诗学》，聂巧平的《宋代杜诗学研究》，史小军的《明代七子派研究》，王进驹的《乾隆时期自况性长篇小说研究》，全秋菊的《古代荒诞剧研究》，陆勇强的《陈维崧年谱》，魏中林的《近代爱国诗潮研究》，赵维江的《古代词的形式嬗变》，程国赋的《三言二拍传播研究》以及我的《唐宋词艺术发展史》。其中或是作者的博士论文，经多年打磨后终与读者见面，或为国家社科基金、国家古委会、教育部、广东省、省高教厅立项的科研项目。从书名可见，它们仍在四个研究方向之内，而就个人而言，则标志着自己研究范围的延伸、扩大和合理发展，对集体来说，则形成了覆盖面较广的研究成果，在多具原创性的同时，也有一定的地方特色。因各人立题和写作的时间不同，篇幅大小有异，自然完成也有先后，丛书打算在两年多内陆续出版。可以相信，在这11种著作出齐后，暨大古代文学和文献的研究也将达到新的水平。

我们这群人，经历不同，长幼有别，来到暨南大学的时间先后有异，治学的兴趣和方向更是有很大差别，但由于今日都在暨南园

内，所作以集体的面目出现，并以“暨南”来命名是很自然的事。然而，其义又非止于此，以“暨南”为名，既起“名片”作用，又意在继承和发扬暨南大学近百年的优良传统，不忘我们今日作为暨南人所应继续的“声教讫于四海”之历史责任。虽古代文学与文献仅是国学研究中的一类，难以尽赅传统国学的全部，但无疑又是国学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在辨析命名同时，我们相信在属于我们近邻的史学和其他学科研究上，暨南大学也定会出现许多新成果，如果这样，我们很愿意为展示暨南国学研究的集体成果而先走一步。

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无论是暨南，还是国学，也同样担负着虽“旧邦”而“维新”的历史使命。我们既然跨越了世纪，当然也要努力造就和见证未来历史崭新的一页，在以本丛书来续写暨大国学研究的历史，迎接暨大百年校庆的同时，我们也将满怀豪情，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到来！

邓乔彬

2004年9月26日于暨南大学明湖苑临风轩

序

章培恒

陆勇强君的《陈维崧年谱》即将出版了，他希望我写一篇序。这在我自是义不容辞的事，因为他的撰写年谱原是出于我的要求；虽然那已经是二十年以前的事了，而且以陈维崧为谱主乃是他的自己的选择。

1984年，勇强被录取为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古典文献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我则忝为导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招硕士生只招古典文献学专业的，招博士生才招中国古代文学专业，这是基于如下的想法：没有古典文献学的基础，研究古代文学是无法深入的；这方面的基础打好了，那么，研究古代文学的哪一段都行，不研究古代文学而研究古代历史、哲学也无所不可。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这种想法并不错。——近些年我所招收的博士生，凡是在硕士生阶段学习古典文献学的都具有明显的优势，无论其出身于哪个学校；当然，他（她）的硕士生导师也必须是称得上学者的学者。

我的这个想法源于我的导师蒋天枢先生，他就是按照这种原则培养我的。虽然当时的客观环境并不利于这样的学习，我自己学得不刻苦，但已受益无穷。所以我希望我的学生也先从古典文献学学起。而且，蒋先生在年轻时写过《全谢山先生年谱》，这是一部很扎实的著作，据说曾受到陈垣先生的称赞。我在二十几岁时邯郸学步，也写了一部《洪昇年谱》（但由于“文化革命”，出版时已

经四十好几岁了，而且还是得到了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李俊民先生、学术界前辈吕贞白先生的眷顾，才能在1979年出版），切身感受到了撰写年谱确是一种很好的学术训练。因此，对于那时招收进来的硕士研究生，我都要求撰写年谱作为硕士论文，勇强所写的就是《陈维崧年谱》。

这部年谱在作为硕士论文提请答辩时曾受到相当高的评价。不过，年谱类的著作并非畅销书，谱主非热点人物者更不易为出版社所接受；《陈维崧年谱》的出版也就搁了下来，而且一搁就是将近二十年。记得以前为了写《洪昇年谱》，曾读过洪氏的诗，在其赠恽南田（格）的诗中有“人生七十由来少，一别谁禁二十年”之句；二十年，对于人生实在是一段极其可贵而又可怕的岁月。但勇强并不为此书的出版延误了如此之久而有所怨悔，反而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对《年谱》不断地增补、提高，使它成为现在这样一部具有高度学术价值的著作。

尽管以“中国文学史”或其类似名目作为书名的著作中都有关于陈维崧的介绍，但陈氏并非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流作家。有一种现象：研究对象越伟大，越有意义，研究著作也就越有价值。其实，如以研究作家而论，无论其所研究的是怎样的作家，只要研究得深入，都能使我们在某些方面看到时代的风貌和个人与时代的相互关系，包括个人在环境逼拶下的顺应、挣扎或反抗，从而给予我们种种启示。这就是元稹并非唐代的第一流作家而陈寅恪先生的相关研究却具有重大价值的原因。这部《陈维崧年谱》的价值也就在于其研究的深入和由此所显示的时代的若干真实样相以及谱主的复杂的内心活动。以年谱类研究著作而论，这样的深度，在我看来，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这里举一个例子，谱主陈维崧被推荐应“博学鸿儒”试及被录取后在京任职的整个过程及其心情：

康熙十七年（1678）正月（阴历，下同），清圣祖命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推荐“学行兼优、文词卓

越之人”——即所谓“博学鸿儒”，无论其人“已仕未仕”，皆可受到推荐；同时宣布这些人集中到京城后，“朕将亲试录用”。到第二年三月初一日，对征集到的博学鸿儒一百四十三人在体仁阁举行御试，考了一天。中午赐宴，“四人一席”，每席“十二簋加四饭”，菜肴丰盛，并有茶供应。日暮尚未考完的，供给蜡烛，直到二更才交卷。被录取的共五十人，分别授侍读、侍讲、编修、检讨。陈维崧以第十名录取，授为检讨。这是我们从《年谱》中可以知道的这事的梗概；也是在一般较详细地记述清代历史的书籍中所可看到的。

然而，这一事件对陈维崧的心情和命运的影响又如何呢？这却只有从《年谱》里才能获得真切的理解了。

他的被荐举是刑部尚书宋德宜提的名。他曾写了一首少见的长诗对宋德宜表示感谢：“今年下明诏，内外交荐拔。我公夙昔心，因之遂触发。竟将微贱名，直向圣人说。……”（《上大司寇蓼翁宋老夫子五言古诗一百二十韵》）但其内心却很感痛苦，致书友人刘榛说：“抵家数日，即为试檄所迫。投铅掷槊，既病未能；逐队随行，又添颜甲。”他为自己的不能不去应博学鸿儒试而深为羞惭——“颜甲”。

同时，他的好友也对此予以同情和理解。如徐喈凤、曹亮武分别在送其入京的词中说：“……逸兴每贪吟月下，闲身宁肯走尘中？征书促，谷口鸣驺，难留湖海元龙！”（徐喈凤《昼锦堂·通邑同人公饯其年，叠前韵》）“……为问何人？不谋猿鹤，荐雄文似。纵持觞幸尔，千秋知遇，难胜却、伤离意！”（曹亮武《水龙吟·迦陵应召入都》）范国祿《送陈维崧应召入都六首》之一更公然说：“梦卜勤求事若何，近来破格已加多。更烦摆此弥天网，特为诸君设一科。”当然，还有不少人为他庆贺，如吴绮的《闻其年以博学弘词荐，为赋短歌》即说：“陈郎本在泥塗中，一朝走入甘泉宫。掀髯脱却犊鼻褌，乃知吾道非终穷。……”但这显然与陈维崧的真实内心相矛盾。

入京之后，他一面不得不繁忙地做着各种应酬，“脰脯之贄溢于堂，四方之屣交错于户。其年辄提笔缀辞，益与酬酢不休”（徐乾学《陈检讨志铭》）；一面却独自咀嚼着内心的深沉痛苦：“榷关税苦客怀恶，过市颇厌人声嚣。”（陈维崧《张尔成先生招同白仲调、家纬云弟灯下赏菊，次日作长句奉谢兼柬令嗣子淑孝廉》）

等到应试被录取，任职翰林院，自然被一些人羡慕为“膺不世之遇”（毛际可《陈其年文集序》），但其内心却越感寂寞与苦闷，对故乡更是无限怀念、生死萦系。他的《与冒辟疆书》说：“侄以麋鹿之性，甫入樊笼，不觉神魂错莫。……东皋旧好，时切怀思，虽阡陌都非，朋从已换，而酒旗歌板，往事难忘。纵使辽鹤难归，蜀鹃已化，犹当盼行云以结想，托流水以通辞。……”

他在京城做了三年官，一面要写诗词感谢皇帝的恩德、显宦的礼遇，因而不乏《八月三十日赐藕恭纪》、《雪后陪益都夫子游祝园敬和原韵四首》之类的作品，另一方面，个性与环境的矛盾、冲突以及由此所形成的痛苦却愈益剧烈：居住的狭隘、烦嚣，饮食的艰苦、不适固然使他难以忍受，在官场中遭遇到的束缚、屈辱更是一种锥心的痛楚。请看他的这些诗篇：

城隅僦老屋，柱础半欹压。督隶亟粪除，课仆事畚鍤。篙腰刈葶苈，墙脚砌蛎蛤。……聊用妥琴书，差堪展巾箠。独苦迫闾闾，跬步碍履屨。……叫卖尤可憎，未晓便呀呷。（《寓舍逼近市廛，晨夕闻货卖者哗嚣声，援笔漫述》。按，徐乾学《陈检讨志铭》亦云：“其年所居在城北市廛，庖陋才容膝，蒲帘土鍤。”）

都城百事君所见，刮毡龟背愁无毛。园官送菜苦酸涩，三日博得一冷淘。我今骨相耐贫薄，空仓饥雀拼嗷嗷。（《送梅耦长还宛陵》）

我生本贫薄，然不耐蔬素。南人侨北地，食性两相忤。硬饼累齧颚，官羊招啜呕。时时冀填仓，顿顿怕蒸瓠。（《春夜

朱锡鬯、陆义山两君招饮，饌甚甘腴，一饱以后，快然成诗，得二十四韵》)

两年缚朝衫，小心事卿相。同袍四五人，各各色惆怅。(《春杪同诸子饮刺梅园古松下》)

三载溷长安，蹙蹙鸟在笄。平明开九门，噓呷盛纨袴。期门羽林儿，肥者白如瓠。青丝络马头，挥鞭有余怒。搯人狭巷间，偏仄不使度。问尔何官职，视尔瘦行步。良久得官名，戟手掷榆去。尔曹在世上，穷薄天所赋。归来色死灰，凄哽仗谁诉。(《送惠元龙南归》。按，此所谓“期门羽林儿”，为皇帝的侍卫。)

在经过三年物质上和精神上的磨折之后，陈维崧感到自己再也撑不下去了，生命即将结束。于是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四月十三日写了一首《愁春未醒·墙外丁香花盛开感赋》，到五月初七日就去世了。词的上片为：“攀来尙隔，望处偏清。算开到此花，阑珊春已在长亭。滴粉搓酥，小红墙角倍分明。年年此际，笼归马上，递遍春城。”此词见于《迦陵词全集》卷十，末有其弟陈宗石小注：“此先兄壬戌年四月十三日作也，先兄即于五月初七日捐馆。读‘算开到此花，阑珊春已在长亭’十二字，竟成词讖。”似乎认为陈维崧在写了含有此十二字的这首词后很快去世乃是巧合。但此词在《湖海楼词》中，题目“墙外丁香花盛开感赋”后又有“索京少、戴山和”六字，而南开大学图书馆所藏抄稿本《迦陵词》，此词后又有蒋京少（景祁）跋语：“此先生四月十三日作，绝笔也。先生三年冷署，人情炎凉，时时托之笔墨，此词其一也。是时先生索予辈属和，予草草命笔，实不知先生意指所在。不意此篇而后，遂如广陵不复弹矣，噫！”末署“壬戌端阳后三日，京少记。”则此跋语实写于维崧去世后的第二日。蒋京少认为，正如嵇康在临刑前弹《广陵散》是意识到此为自己的最后一次弹奏，陈维崧也是有意识地把这作为自己的最后一首词的，只是蒋京少当时